

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演化与前景^{*}

韩建伟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作为对既有宗派主义研究与族群安全困境理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在多元族群国家中,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常使各族群陷入普遍的不安全感,为求自保,族群往往呈现宗派化倾向;然而,此种行为易被对立族群解读为具有恶意或进攻性,从而触发双方间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与宗派化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冲突爆发。在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不断螺旋升级,是导致其民族国家建构遭受重大挫折的关键因素。叙利亚的族群宗派化现象萌芽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并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获得初步发展,族群安全困境开始酝酿。然而,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真正形成,主要发生在叙利亚独立后的党争政治时期以及阿萨德政权建立之后。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正是阿萨德政权长期推行宗派化政策,导致阿拉维派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主体的族群之间安全困境不断升级的结果。至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虽被逊尼派反对力量推翻,但由逊尼派主导的过渡政府仍面临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的结构性挑战。这也为外部势力的干预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得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关键词 族群宗派化 安全困境 叙利亚 冲突

引言

2024年12月,执政54年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短短数日内被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的“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 HTS)推翻,引发国际社会对叙利亚未来走向的广泛关注。由于阿萨德政权主要代表少数教派族群阿拉维派的利益,此次政权更迭呈现出鲜明的族群冲突特征。随着逊尼派阿拉伯人开始主导国家进程,该国在实现国家统一与重建国族认同方面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其冲突根源已有诸多讨论。然而,2017年阿萨德政权重新控制局势并趋于稳定后,学界对其政权内部动态的关注有所减弱,以致该政权此次迅速垮台令外界颇感意外。这一认知落差反映出对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中深层次矛盾的研究尚不充分。为系统阐释叙利亚从“民族国家建立—内战爆发—政权更迭”的历史演变路径,并对其民族国家建构前景作出客观深入的研判,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叙利亚国内族群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现有关于叙利亚冲突与内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族群冲突理论,构建“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分析框架,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探讨以下问题:叙利亚的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是如何形成并相互强化的?安全困境又是如何逐步升级并最终导致全面内战的?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叙利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族群问题及治理研究”(项目号:22JJD810038)的阶段性成果。

亚过渡政府能否摆脱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推动统一包容的民族国家建构?

一、关于叙利亚冲突的主要论点及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框架

(一) 关于叙利亚冲突的主要论点

在有关叙利亚冲突及内战根源的研究中,“宗派主义论”是主流观点之一。该观点认为,不同教派、族群、部落及地区之间的宗派主义(Sectarianism)是导致叙利亚陷入冲突与内战的主要根源。代表性学者尼古拉奥斯·范·达姆(Nikolaos Van Dam)指出,叙利亚的宗派主义被政治精英所利用,并逐渐走向极化。阿萨德政权的政策加剧了宗派对立,而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激进势力也进一步推动了宗派主义的发展。^①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学者关注阿萨德政权对宗派主义的工具化运用,认为其目的在于维护一种新世袭主义统治结构。^②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宗派主义被理解为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在前复兴党时期受到压制,复兴党执政后重新抬头,并在内战爆发后走向激进化。^③

然而,“宗派主义论”也面临诸多批评,尤其是“宗派主义”这一概念本身较为模糊,缺乏严格的科学界定标准。^④主流观点认为宗派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用于在特定人群中分配权力、特权及/或施加暴力”^⑤。但学界对宗派主义的理解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这主要源于“宗派”概念本身的分歧。狭义上,宗派指的是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派别(即教派),因此宗派主义常被等同于教派主义。它指对某一宗教团体的强烈认同,强调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并在政治化过程中凸显宗教信仰的对立。^⑥如有学者从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的角度分析中东地区沙特与伊朗阵营的对抗,便是基于狭义宗派主义概念的理解。^⑦广义上,宗派泛指基于不同身份和利益形成的各类团体或派别。因此,宗派主义不限于宗教或教派主义,还涵盖基于祖先、氏族、部落、地域等多重身份形成的团体意识及排他性倾向。此外,有学者指出,宗派主义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其被视为冲突背后的“古老仇恨”,因此被看作是一个静态概念,从而忽视了宗派冲突通常是在近现代之后才变得更加频繁这一事实。^⑧以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宗派冲突为例,历史上这两大教派虽存在分歧,但并未总是发生冲突,在大多数时期能够共存。直到现代,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两大教派的矛盾才逐渐成为中东地区宗派冲突的主线。

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宗派化”(Sectarianization)概念,认为“宗派化”指的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环境下,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围绕具有特定身份的民众进行动员的过程。^⑨与宗派主义概念相比,

①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 th Part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p. 3 – 29.

② Raymond Hinnebusch, “Sectarianism and Governance in Syria,”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9, no. 1, 2019, p. 47.

③ R. Hinnebusch, “Ident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ulti-Sectarian Societie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Sectarianism in Syr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6, no. 1, 2020, pp. 138 – 154.

④ F. Haddad, “Sectarian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Middle Ea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6, no. 1, 2020, pp. 123 – 137.

⑤ P. G. H. Pinto, “Shattered Nation: The Sectarianization of the Syrian Conflict,” in N. Hashemi & D. Postel (eds.),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3 – 142.

⑥ Raymond Hinnebusch, “Sectarianism and Governance in Syria,”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19, no. 1, 2019, p. 41.

⑦ 汪波、李立:《中东地区当前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与冲突》,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

⑧ N. Hashemi, D. Postel (eds.),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

⑨ N. Hashemi, D. Postel (eds.), *Sectarianization: Map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4.

宗派化更能体现宗派冲突的情景特征和有目标的政治动员实践,是对静态宗派主义概念的弥补与拓展。因此,本文认为,宗派化指的是政治精英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对特定身份群体进行组织动员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对其他群体的排斥与敌对行为的强化。

宗派化通常沿着特定群体的身份界限形成。那些自历史上形成的有独立文化特征的“族群”(ethnic group),是容易在特定环境下被政治动员的群体,这就是“族群宗派化”问题。族群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可辨识的集体,但至于成员能够成为一个集合的要素或者界定成员身份的标准,学者侧重有别。^①如血缘(祖先)、语言、宗教、教派、部落、地域等都可成为界定族群身份的标志,也令族群概念“极具弹性和延展性”^②。本文将族群视为具有共同文化认同与强烈归属感的群体,“一个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这部分成员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有着共同的起源并共享共同文化中的重要成分,而且,这些成员还会参加那种代表共同起源和文化的集体活动”^③。一旦形成“自我”意识,族群便成为具有共同利益感知的集体。因此,族性认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对族群的集体权利的追求。^④当族群的集体权利面临外部威胁时,在感受到不安全的情况下,族群精英会出于“自助”需要不断加强内部凝聚力与政治动员能力,同时会对其他族群产生排斥、歧视甚至伤害行为,这正是宗派化的体现。

通常,在具有鲜明族群特征的冲突爆发之前,族群之间已在宗派化进程中形成对立关系。为深入阐释叙利亚从族群宗派化走向内战冲突的演化逻辑,本文引入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概念,并进行理论整合。

(二)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框架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最早由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提出,后经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 Herz)系统阐述。赫兹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群体、个人及其领导者普遍担忧遭受攻击、支配或毁灭。为求自保,他们不得不持续追求更多权力,而这又加剧其他行为体的不安全感,迫使其做出最坏准备,从而形成权力竞争与安全积累的恶性循环。^⑤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进一步结合“螺旋模型”对安全困境的演化加以阐释。安全困境的悲剧在于:各方本无意战争,却因彼此的安全需求与误判而陷入冲突。国家间一系列敌对互动强化了彼此对对方意图的负面认知,导致冲突不断升级。^⑥

安全困境理论后被广泛应用于族群冲突研究。例如,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J. Kaufman)指出,当“敌对的民众、好战的精英以及族群间的安全困境三者并存时”,族群战争便容易爆发。^⑦唐世平提出广义族群战争框架,认为安全困境所引发的螺旋模型是族群战争发生的“元机制”,而族群精英的有组织动员及其引发的群体间互动则直接促成战争爆发。^⑧

然而,仅将安全困境引入族群冲突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即未能深入阐释族群间形成安全困境的具体原因。现有研究往往简单套用国家层面的“自助”逻辑,却忽视了族群“自助”行为的特殊性。实际上,族群的“自助”本质上正是宗派化行为,这也构成“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的基本逻辑。

① 张琳:《“族群”与“民族”:古代群落研究的叙词辨析——兼论古代犹太人的民族特性》,载《世界民族》,2023年第6期。

② 蒋俊:《部族、族群与民族:非洲研究中主要人群概念的辨析与定位》,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

③ J. Milton Yinger,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1, 1985, p. 159.

④ 周平:《族性身份的塑造及其政治后果》,载《世界民族》,2024年第2期。

⑤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1950, p. 157.

⑥ 焦兵:《族群冲突:基于安全困境的解释》,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3期。

⑦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Elites, Masses, and Moscow in Moldova’s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p. 109.

⑧ 唐世平著,李思缙译:《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

根据经典理论,安全困境产生的前提是无政府状态。在现实中,族群间的安全困境不仅可能出现在无政府状态下,也可能发生于一个仍具治理能力,但其族群政策明显偏向某一群体的政权之下。“当中央政权被某个族群独占或支配,并转变为一个实际上的群体内部精英集团,而其他族群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助来维护自身安全时,‘安全困境’也会产生。”^①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弱政府状态”。中央政府权力因主要受某一族群控制导致执政根基较弱,为了维护本族群利益与其他族群形成安全困境。事实上,中央政府偏袒某一族群并系统性排斥其他族群的做法屡见不鲜,且常通过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权力运作实施。^②研究表明,与由多数族群执政的国家相比,由少数族群掌控政权的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③代表少数族群利益的政权往往倾斜支持本族成员,形成以族群为界限的资源分配体制。^④这就是弱政府的宗派化行为,本文所讨论的叙利亚正属于此类情况。

简言之,“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指的是在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下,某一族群因感受到生存威胁而产生强烈不安全感,在政治精英的领导下奉行宗派化行为以增强自身防御能力。该行为引发其他族群的对抗反应,导致族群沿身份界限形成对立阵营,安全困境由此形成。族群宗派化既包括边缘族群为捍卫本族利益所采取的防御行为,也包括执政族群以政府名义推行的宗派化政策。尽管宗派化行为多属防御性质,但对立方常将其解读为具有进攻意图。安全困境一旦形成,会进一步加剧敌对族群的宗派化倾向,导致安全困境不断升级,形成恶性循环。矛盾不断螺旋上升后,某一意外事件的触发便可能导致族群冲突或战争的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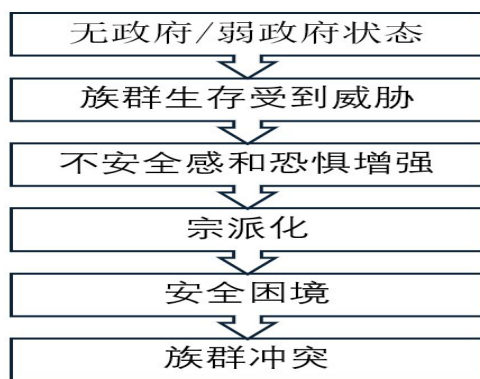


图1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因果机制^⑤

过去十余年间,叙利亚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暴力冲突。从表面看,这是中央政府与反叛组织之间的对抗,实则具有深刻的族群宗派冲突特征。阿萨德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族群宗派斗争的产物,属于代表少数教派族群执政的弱政府,在执政期间持续推行宗派化政策,导致内战爆发。在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实为“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逊尼派阿拉伯族群与其他少数族群的宗派化不断加剧,陷入难以调和的族群间安全困境。叙利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交织、不断升级的悲剧性结果,也将对未来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深刻影响。

① 唐世平:《“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Evan S. Lieberman, Prema Singh,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Ethnic Viol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5, no. 1, 2012, pp. 1–24; Julian Wucherpfennig, Nils W. Metternich, Lars-Erik Cederman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Ethnicity, The State, 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4, no. 1, 2012, pp. 79–115.

③ J. D. Fearon, K. Kasara and D. D. Laitin, “Ethnic Minority Rule and Civil War Onse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1, 2007, pp. 187–193.

④ Kevin Mazur, “Networks, Informal Governance, and Ethnic Violence in a Syrian City,” *World Politics*, vol. 72, no. 3, 2020, p. 485.

⑤ 图作者自制。

二、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缘起

(一) 叙利亚的族群分类及宗派化的历史根源

从历史上看,“叙利亚”泛指地中海东岸的广阔区域,涵盖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及土耳其南部伊斯坎德伦等地。^① 这一地区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历来族群交融频繁。其多样的地理环境——山地、沙漠与沿海地带并存——形成了若干相对隔绝的次区域,历史上常成为弱势族群的避难所。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如阿拉维派^②、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和德鲁兹派等,长期在此躲避逊尼派政权的压迫。其他一些族群如亚美尼亚人也是该地区的古老居民,一战爆发后更多亚美尼亚人来此避难,形成亚美尼亚聚居区。^③ 除此之外,自古以来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地区繁衍生息,成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至1946年建国时,叙利亚已形成多元族群并存的格局。

叙利亚族群大致可从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其一,按血缘或族裔划分,主要分为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非阿拉伯族群则包括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切斯人、亚述人等。其二,按宗教信仰划分,主要分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群体。公元1世纪后,叙利亚受罗马帝国统治,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大部分人口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的基督教族群既包括非阿拉伯人(如亚美尼亚人),也包括部分阿拉伯人。因此,叙利亚并非所有阿拉伯人都是伊斯兰教徒。其三,按教派进一步细分。前两类划分皆较为笼统,难以体现叙利亚族群构成的复杂性。实际上,按教派形成的身份差异是区分叙利亚不同群体的更重要标准。如除了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伊斯兰教群体存在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派别;基督教群体亦分希腊东正教、叙利亚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等多个教派。这些“教派族群”之间的身份差异比外界想象的大得多。

由此可见,叙利亚族群身份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族裔、宗教、教派甚至领地皆可成为划分依据,且存在明显的主体与少数之分。自阿萨德政权建立以来,政府刻意回避国内族群教派问题,未再按族群身份进行人口普查。目前可考的族群数据仍源于叙利亚独立初期的一次调查:1947年人口统计显示,逊尼派约占69%,阿拉维派约占11%,德鲁兹派约占3.2%,希腊东正教徒约占4.8%,亚美尼亚人约占3%,伊斯玛仪派和什叶派各约占0.3%。^④ 该普查未将库尔德人单独列出,一方面因其族群身份未获政府承认;另一方面因他们多信仰逊尼伊斯兰教,故被计入逊尼派人口。若排除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约占全国人口的57.4%,是无可争议的主体族群,其余群体则被归为少数民族。^⑤ 在政治影响力方面,少数民族通常难以在国家层面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伊斯兰教少数派,因教义、仪式或节日等方面与逊尼派存在差异,常被后者视为异端。逊尼派阿拉伯人与这些少数教派之间的矛盾,甚至超过其与基督教族群的历史积怨。

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叙利亚的主体地位,可追溯至早期伊斯兰扩张时期。尽管叙利亚曾长期受基督教文明浸润,但在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定都大马士革后,逐渐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即便阿巴斯王朝将政治中心迁至巴格达,叙利亚已完成其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奥斯

①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页。

② 阿拉维派是什叶派中的一个分支,与什叶派的其他支派存在教义差异,因此文中与什叶派(主要指“十二伊玛目派”)作了区分。

③ Michael Goodyear, “Syrian-Armenians and the Legal Snares of Armenian Citizenship,” 30 May, 2019, <https://armenianweekly.com/2019/05/30/syrian-armenians-and-the-legal-snares-of-armenian-citizenship/>, 访问时间:2025-8-1。

④ Yaron Friedman, “The Enigma of the Number of Alawis in Syria: 11% Indeed?”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3, no. 1, 2026, p. 18.

⑤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th Part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 1.

曼帝国时期,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主人意识”进一步强化。在帝国早期,宗教信仰通常比族裔身份更能作为集体认同的依据。^① 叙利亚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帝国主体信仰一致,因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享有更高地位,其精英阶层多与帝国合作。与之相对,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少数民族则未将自己视为奥斯曼统治的受益者。^② 这种分野加剧了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隔阂,尤其精英阶层与其他族群之间形成阶级对立,为日后族群宗派化埋下伏笔。

在奥斯曼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叙利亚族群身份的区分仍以文化因素为主。然而,受地理隔绝影响,各族群间关系疏离,少数民族尤其维持着高度自治的传统。“东地中海地区已形成一种自治制度,逊尼派穆斯林虽占主导地位,但德鲁兹人等群体已建立起高度封闭的体系。”^③ 每个族群社区宛如一个独立的“世界”。^④ 随着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启动,各族群在国家中的地位经历剧烈变动,甚至出现实际地位与影响力错位的现象,族群宗派化由此萌芽。

(二) 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酝酿

现代叙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始于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阿拉伯国家独立迎来历史机遇。然而叙利亚的独立进程屡经波折,很快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传统观点常将法国“分而治之”政策视为少数民族与逊尼派阿拉伯人关系恶化,乃至宗派化的主因。实际上,早在奥斯曼帝国晚期,西方列强就已开始挑动叙利亚地区的族群矛盾。法国、英国和俄国常以“保护少数民族”为名干涉帝国内政,例如法国宣称保护马龙派基督徒,俄国自命为希腊东正教徒的保护者,英国则与德鲁兹派和犹太人保持特殊关系。这类外来干预引发奥斯曼中央政府及逊尼派阿拉伯人对少数民族的不满与敌视,激化了族群矛盾。^⑤

在权力结构方面,20世纪初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城市与乡村均占据经济和政治优势,却未能对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有效控制。少数民族虽地处偏远、社会地位低下且常被视为异端,但其自治传统为内生性生存提供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多呈聚居分布:阿拉维派主要聚居在西北部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山区,德鲁兹派集中于西南部苏瓦达地区,伊斯玛仪派则居住于中部,形成“集中的少数”。相比之下,逊尼派阿拉伯人虽遍布全国,却多以部落或家族为单位分散居住,缺乏统一组织性,这使他们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难以像少数民族那样形成高度凝聚力。

1920—1946年间,法国殖民统治深刻改变了叙利亚族群实力结构。为压制民族独立运动,法国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刻意利用族群分歧制造对立,将叙利亚划分为德鲁兹、阿拉维、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四个区,使族群因素首次在政治上产生实质影响。^⑥ 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法国对阿拉维派的扶持。委任当局利用该派长期受压制的不满情绪,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予以支持,使其逐渐成为法国在叙利亚的代理势力,并为日后主导国家政权埋下伏笔。^⑦ 除了阿拉维派的主体意识在增强外,其他少数民族如德鲁兹人,虽未获得同等优待,甚至遭受残酷剥削,却在反抗过程中强化

^① Bruce Masters, *The Arab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16 - 1918: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 - 5.

^② Bruce Masters, *The Arab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16 - 1918: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7.

^③ [英]尤金·罗根著,廉超群、李海鹏译:《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2—46页。

^④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 th Part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 3.

^⑤ Asma Alghoul, *Sec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Syria: A Balance of Fear and Interes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enine Abboushi, Sharq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2018, p. 13.

^⑥ Florence Gaub, "Syrian Separation: Why Division is Not the Answer," *Federal Academy for Security Policy*, no. 17, 2016, pp. 1 - 2.

^⑦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3—176页。

了政治动员能力与自治诉求。^① 这为族群向宗派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总体而言,法国委任统治以掠夺和剥削为主,并未建立有效治理体系,叙利亚长期处于实质上的无政府状态。在缺乏中央政府保障的背景下,各族群为自保纷纷采取不同策略:或与殖民者合作以改善处境(如阿拉维派),或强化自身动员以抵抗压迫(如德鲁兹派),或进一步巩固自治地位(如库尔德人)。与此同时,逊尼派阿拉伯人遭受系统性排斥,且因内部整合不足,在少数民族崛起的背景下深感自身地位衰落。尽管各族群共同反抗法国统治,但彼此关系并不融洽,尤其是少数民族担忧逊尼派阿拉伯人借助民族斗争提升其优势地位。^② 其结果是,在反殖民斗争中,叙利亚各族群的裂痕不仅未能弥合,反而因各自强化本群体认同与动员能力,并对其他群体产生排斥,族群宗派化逐渐抬头。然而,在叙利亚完全独立前,各族群尚存合作需求,未直接相互构成威胁,安全困境仍处在酝酿阶段。直至法国殖民者撤离、叙利亚正式独立并启动民族国家建设,族群矛盾才不断激化,宗派化进程加速,安全困境逐步形成。

三、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形成与恶化

1946年,在二战后民族解放浪潮的推动下,叙利亚赢得独立。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尽管逊尼派阿拉伯人有口人口优势,却未能主导国家建设进程,反而逐渐被少数民族超越。权力与地位的失衡导致族群宗派化愈演愈烈,族群间的安全困境由此正式形成。

(一) 叙利亚独立后初期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形成

独立初期的叙利亚(1946—1970年)政局动荡,军事政变频发。其根源在于新生共和国政治体制尚不成熟,虽仿效西方建立代议民主制度,却缺乏实施民主的社会基础。在脱胎于封建部落社会、族群构成多元的背景下,政党往往依赖特定家族、部落或族群的支持生存,并排斥代表其他族群的政党。“选举式民主靠政党来组织,而政党背后是族群、教派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样选举式民主自然演化为‘党争民主’。”^③事实上,在1970年阿拉维派复兴党军官哈菲兹·阿萨德掌权之前,少数民族精英宗派化行为已相当明显,持续对逊尼派阿拉伯精英进行排挤与清洗,按族群划界的安全困境逐渐形成。

1947年,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简称“复兴党”)成立,该党深刻影响了叙利亚数十年的国家建构进程。复兴党在派系斗争中逐渐由小党崛起为执政党,其宗旨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与社会主义。该党主张所有宗教、教派与族群一律平等,这一追求社会公平的理念在山区与农村的少数民族中引起广泛共鸣,却对城市中的逊尼派中上层阶级吸引力有限。复兴党创始人之一米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k)身为希腊东正教徒,清醒地意识到整合叙利亚分裂局面的关键在于超越教派与族群分歧,因而倡导世俗主义道路。复兴党将伊斯兰教视为阿拉伯民族的文化遗产,但不主张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坚持穆斯林与基督徒权利平等。

然而,复兴党自成立之初便隐含族群权力再分配的倾向。阿弗拉克本人与德鲁兹派等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导致党内少数民族成员在人数与职位上占据优势。^④ 复兴党原本旨在推动各族群平等、保护少数群体权益,却客观上打破了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主导地位,为少数民族地位的上升创造

① 赵娜:《德鲁兹人与叙利亚反法大起义》,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3期。

②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ṭh Part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 17.

③ 杨光斌:《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8—39页。

④ Adham Saouli, “The Tragedy of Ba’thist State-Building,” in Raymond Hinnebusch, Omar Imady (eds.), *The Syria Uprising: Domestic Origins and Early Trajec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19.

了条件。

少数民族大量入党引发逊尼派成员的不安,两派精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宗派化斗争加剧。逊尼派官员曾试图限制少数民族党员规模,但遭到强烈抵制。随着复兴党在国家政治中地位提升,族群宗派斗争不断激化,至1963年达到高潮,大量逊尼派官员被清洗,阿拉维派等少数民族进一步巩固了在党内的优势。在新党员招募中,逊尼派常受歧视,而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和基督徒则受到优待。^①

从独立至1970年阿萨德政权建立,叙利亚长期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阿拉维派等少数民族为维护自身地位,积极争夺更多资源与权力。尽管其宗派化行为的动机多属自保性质,却引发了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代表的族群的强烈不安全感。后者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不断积累,从而形成了安全困境。在自感处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逊尼派阿拉伯人也开始加强自身的宗派化趋势,导致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加剧,并为潜在冲突埋下伏笔。

20世纪30年代,叙利亚逊尼派阿拉伯人成立穆斯林兄弟会分支。该组织在叙利亚建国初期曾参与政治,但随后在少数民族的排挤下逐渐边缘化。1963年后,穆兄会转向激进斗争,成为复兴党政权的主要反对力量,却因采取暴力手段遭到政府严厉镇压。穆兄会未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政治纲领模糊,主要代表逊尼派中上层精英,未能广泛动员中下层民众。^②正如有研究所指,“精英对族群身份、仇恨与恐惧的操纵”是引发族群冲突的关键动员机制。^③从宗派化角度来讲,叙穆兄会没能对逊尼派阿拉伯族群进行广泛政治动员是其失败的重要根源。

这一时期的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不仅体现在被边缘化的主体族群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中央政府之间,其他少数民族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德鲁兹人、库尔德人等历史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任何政权下皆感到不安,却缺乏与中央政府或强势族群直接对抗的能力,因而更倾向于通过强化内部凝聚力实现“领地化”。在这些族群的聚居区内,他们往往形成地域性优势,并对外族表现出排斥行为。叙利亚族群“划地而治”也是宗派化的重要表现,对形成族群间安全困境产生深刻影响。

少数民族有时也通过与其他族群或中央政府合作以改善自身处境。例如,在阿拉维派全面掌权前,德鲁兹派曾与之结盟共同排挤逊尼派;然而,阿拉维派独揽大权后,德鲁兹派再度被边缘化。可见,在叙利亚事实无政府状态下,宗派化成为各族群维护自身安全的普遍策略,但这只会进一步加深族群隔阂,使安全困境长期化。

(二) 阿萨德政权的宗派化政策与族群安全困境的恶化

阿萨德政权的宗派化政策被视为引发内战的关键因素。^④1970年,阿拉维派军官哈菲兹·阿萨德发动名为“纠正运动”的政变,独揽大权,并将议会民主制改为总统共和制。这一改制虽终结了党争乱局,却加剧了族群间安全困境并令宗派化趋势进一步发展。阿萨德政权具有明显的两面性:表面坚持复兴党的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塑造跨宗派形象以争取广泛支持;实质上,则依托领导人的族群背景,利用所属教派巩固以家族为核心的特权体系。

哈菲兹执政初期,叙利亚的国家主义取得显著进展。一方面,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合作社等经

^①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 th Part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p. 16–36.

^② 朱传忠:《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及其特点》,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

^③ 唐世平著,李思缇译:《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هدى زين: الطائفية ما بعد الأسد: في لحظة اكتشاف الدولة والمجتمع, The Arab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Syria Studies, <https://www.harmon.org/dialogues/7الطائفية/>, 访问时间:2026-3-18。

济社会政策,赢得跨族群中下层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下,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及反帝叙事(如巴以冲突),强化国民团结意识与国家认同。^①此外,阿萨德政权将商业资源和行政权力与逊尼派及其他族群精英分享。阿拉维派官员与以逊尼派为主的商业伙伴形成一个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军事—商业综合体。^②逊尼派商人主导金融贸易部门,基督徒与德鲁兹派则广泛在公共部门任职。^③军政高层中亦不乏受重用的逊尼派人士。^④尽管这些逊尼派精英的加入带有投机色彩,无法掩盖该族群整体被边缘化的现实,但阿萨德政权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跨宗派包容的表象。

然而,哈菲兹明显倾斜于阿拉维族群的政策,使得政权的宗派化特征难以掩饰。作为长期受压迫的群体,阿拉维派将哈菲兹视为保护者,使其免受穆兄会等逊尼派激进势力的威胁。^⑤阿萨德政权的稳定与阿拉维族群整体命运高度关联在一起。哈菲兹任命其兄弟及阿拉维派亲信官员指挥精锐部队与安全机构,将核心权力集中于家族成员、所属部落与同乡手中。^⑥

提升阿拉维派整体生存状况成为政权工作的重点。该族群在公共部门就业中享有优先权,医疗与教育资源向拉塔基亚等阿拉维聚居区倾斜,以缩小地区间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初,政府与私人投资集中投向拉塔基亚与塔尔图斯;从塔尔图斯选派赴苏联受训的100名学生中,97人为阿拉维派,而该地区阿拉维派人口占比为55%。^⑦

显然,阿萨德政权将强化阿拉维派实力作为维护统治的核心手段,同时通过吸纳逊尼派及其他族群精英构建外围权力结构。然而,此举凸显了政权宗派本质,加剧了族群矛盾。^⑧阿萨德政权宗派化政策源于出身弱势族群的不安全感及对失权的恐惧,却引发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代表的族群的强烈不安全感与仇恨心理,双方安全困境持续恶化。

1970年后,叙穆兄会成为阿萨德政权首要威胁,双方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976年,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内战,支持基督教马龙派对抗穆斯林与巴勒斯坦势力,引发国内民众不满,针对阿拉维派军官的暗杀活动频发。1980年,哈菲兹遭遇穆兄会未遂刺杀,随后展开报复,约500名穆兄会成员被杀。穆兄会则通过舆论宣传,指责阿拉维派为非穆斯林,称其“不承认伊斯兰,不遵从沙利亚法”^⑨。1982年,穆兄会与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军在哈马发生了一场血腥战斗,持续近一个月,以穆兄会惨败而告终。穆兄会遭此重创后,难以继续在国内发挥重要影响力,幸存流亡者大多逃离海外。

哈马冲突是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精英宗派化斗争加剧导致安全困境螺旋上升为冲突的结果。此时期阿萨德政权仍具备跨宗派合法性,而穆兄会因未能提出吸引逊尼派中下层民众的纲领,缺乏广

① H. Dukhan, "The End of the Dialectical Symbiosis of National and Tribal Identities in Syr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8, no. 1, 2022, p. 148.

② R. Hinnebusch, "Ident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ulti-Sectarian Societie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Sectarianism in Syr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6, no. 1, 2020, p. 149.

③ Rustum Mahmoud, Stephan Rosiny, *Opposition Visions for Preserving Syria's Ethnic-Sectarian Mosaic*, 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 2015, p. 8.

④ Yahya M. Sadowski, "Patronage and the Ba'th: Corruption and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Syria,"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9, no. 4, 1987, p. 446.

⑤ Leon Goldsmith, Syria's Alawis, "Structure, Perception and Agency in the Syrian Security Dilemma," in Raymond Hinnebusch, Omar Imady (eds.), *The Syrian Uprising: Domestic Origins and Early Trajec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8, p. 146.

⑥ Yahya M. Sadowski, "Patronage and the Ba'th: Corruption and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Syria,"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9, no. 4, 1987, p. 446.

⑦ Raphael Lefevre, *Ashes of H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70.

⑧ M. Menshaw, "The Irony of Sectarianism: Sectarianizing by Desectarianizing in Syria,"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1, issue 2, 2022, pp. 131 - 150.

⑨ Nikolaos Van Da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th Party*,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 110.

泛动员能力,最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政府军。受此影响,政权进一步强化宗派化手段。哈菲兹清洗军队和复兴党中数百名逊尼派人员,更加依赖他认为能得到忠诚支持的群体——阿拉维派。^①同时,政权倚重秘密情报机构加强安全管控,大量逮捕反政府嫌疑人,逊尼派成为重点监控对象。冲突亦加深了叙利亚民间的族群宗派情绪。20世纪80年代前,不少逊尼派平民与库尔德人、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毗邻而居、关系融洽;冲突后,阿拉维派与逊尼派之间产生深刻隔阂与敌意,并蔓延至其他族群之间。库尔德人、德鲁兹人等群体的自治意愿进一步增强,族群间的宗派化对立进一步加剧,安全困境不断恶化。^②

(三)巴沙尔执政后的宗派极化与安全困境升级

2000年,哈菲兹去世,其次子巴沙尔继任总统。此时叙利亚族群宗派矛盾已积重难返,巴沙尔的政策未能缓解族群安全困境,反而推动其走向极化。执政初期,他试图推行以西方为模板的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改革,即“大马士革之春”,但该改革因阿萨德家族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夭折。改革失败后,由于对执政安全感到不安,巴沙尔更加依赖家族成员掌控核心权力与资源,宗派化趋势进一步强化。

此举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政权的宗派封闭特征日益突出。哈菲兹时代形成的阿拉维派政界与逊尼派商业精英联盟在巴沙尔时期受到冲击。新的商业机会日益集中于总统家族及其衍生的封闭利益集团,疏远了众多传统逊尼派商业伙伴。尽管逊尼派精英在特权商业网络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他们大多与阿萨德家族存在姻亲关系,或与安全部门存在腐败关联。研究表明,巴沙尔时代叙利亚前100位商界领袖中,23%为高官或其合作伙伴后代;48%为新晋商人,其中多数与安全部门关系密切,部分更与国家领导人有腐败往来。从教派背景看,69%为逊尼派,16%为阿拉维派,14%为基督徒。然而,最富有的十大商人中,多数为与阿萨德家族直接关联的阿拉维派。^③逊尼派及其他族群商业精英沦为附庸,绝大多数逊尼派民众被排斥于权力体系之外,政权形成以阿萨德家族为核心、阿拉维派精英及姻亲成员为外围的封闭体制。另一方面,政权中下层支持者的利益受损,加剧了族群宗派对立。阿萨德政权曾通过惠及各族群农民的政策获取合法性,然而,随着家族庇护主义盛行,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政府削减了农村开支,导致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农民利益严重受损。他们逐渐认为这一世袭政权日益具有宗派化和上层阶级化倾向,对政权的疏离感也随之加深。^④

总之,巴沙尔时代的统治基础较其父时期更为狭隘,叙利亚成为一个以阿萨德家族为顶端、主要依赖阿拉维派及部分利益关联精英维持的宗派国家。政权的宗派化政策引发以逊尼派阿拉伯人为主的族群强烈不满与恐惧,双方安全困境逐步走向公开冲突。

四、叙利亚内战: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

2011年,受“阿拉伯之春”浪潮影响,叙利亚爆发大规模抗议,并迅速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冲突。与以往冲突相比,此次冲突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对阿萨德政权构成严峻挑战。抗议发起

^① Raphael Lefevre, *Ashes of H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74.

^② Asma Alghoul, *Sec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Syria: A Balance of Fear and Interes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enine Abboushi, Sharq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2018, p. 20.

^③ A. Siham, "The Role of the Syrian Business Elite in the Syrian Conflict: A Class Narrativ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9, no. 3, 2022, p. 434.

^④ R. Hinnebusch, "Ident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Multi-Sectarian Societie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Sectarianism in Syr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6, no. 1, 2020, p. 150.

者最初试图超越宗派界限,联合各族群共同推翻政权,发出“我们来自阿拉维派、逊尼派,每一个教派,我们都想推翻政权”的号召。^①然而,现实情况是,早期参与者主要来自贫困且长期被忽视的逊尼派阿拉伯农村与郊区;而同样贫困的阿拉维派、基督徒和德鲁兹人聚居区则相对平静。在叙利亚中部平原,逊尼派城镇拉斯坦(al-Rastan)成为支持革命的重要据点,而阿拉维派城镇拉比(al-Rabie)则坚定支持阿萨德政权。^②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阿拉维派和基督徒因与国家资源联系更紧密而反对革命。^③可见,抗议初期已显现明显的族群宗派分野。不过,逊尼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受长期散居、社区自治及阿萨德政府区别对待等因素影响,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的逊尼派民众最初大多未参与示威。然而,随着冲突升级,族群身份逐渐成为对立边界,越来越多的逊尼派卷入到与政权的对抗中。内战越来越演化为族群宗派性质的冲突,主要是以下因素内外联动的结果。

1. 巴沙尔对抗议活动的宗派化叙事及强制迁徙政策加剧逊尼派阿拉伯族群不安全感。长期以来,叙利亚公开讨论宗派问题被视为禁忌,阿萨德政府以“假装不存在”的态度掩盖宗派矛盾。^④即便在2011年抗议爆发后,巴沙尔在公开讲话中仍保持谨慎,避免直接提及阿拉维派与逊尼派的对立,而是将动乱归咎于“外部阴谋”。他声称有少数人在外部势力操纵下试图制造分裂,利用宗派矛盾挑起内斗。随着和平示威演变为旨在推翻政权的运动,巴沙尔进一步升级言论,指控“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通过煽动宗派暴力分裂国家。由于恐怖组织皆由逊尼派成员构成,这一表态事实上将内战定性为逊尼派与阿拉维派之间的冲突,政权镇压重点也随之转向逊尼派社区。巴沙尔政权实施人口驱逐计划,通过炮击、空袭及对逊尼派村庄的屠杀,迫使大量逊尼派平民离开长期居住的家园。^⑤执行这些行动的主要由阿拉维派组成的政府军与民兵,对逊尼派平民实施无差别袭击。

该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族群宗派对立,促使更多逊尼派阿拉伯平民出于恐惧和自卫团结起来。事实上,由于大多数抗议者和反政府武装属逊尼派,而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等多与政权关系密切,冲突日益与宗派刻板印象及族群清洗行为重叠。其他少数族群常陷入政府军无差别轰炸与反政府武装歧视、暗杀的双重困境。^⑥巴沙尔政权的宗派化政策因而成为冲突持续升级的重要推手。

2. 逊尼派极端组织与人物的反阿拉维宗派化叙事加深了族群对立壁垒。叙利亚内战从和平示威演变为宗派冲突,与逊尼派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煽动直接相关。2012年初,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改名“沙拉”)在叙本土建立了“基地”组织分支,即努斯拉阵线。该组织将冲突描述为阿拉维派和什叶派对逊尼派发动的宗派战争,其宗派化言论加速了抗议向武装对抗转化。^⑦形形色色的逊尼派军事组织以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武器,抨击阿萨德政府的世俗主义及阿拉维派教义为异端。

① Line Khatib, “Tutelag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Shifts Between Secularism and Islam in Syria,” in Raymond Hinnebusch, Omar Imady (eds.), *The Syrian Uprising: Domestic Origins and Early Trajec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8, p. 101.

② Aron Lund, *Syria's Salafi Insurgents: The Rise of the Syrian Islamic Front*, The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2013, p. 8.

③ Rustum Mahmoud, Stephan Rosiny, *Opposition Visions for Preserving Syria's Ethnic-Sectarian Mosaic*, 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 2015, p. 5.

④ M. Menshaw, “The Irony of Sectarianism: Sectarianizing by Desectarianizing in Syria,”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1, issue 2, 2022, pp. 131–150.

⑤ Enrico Bartolomei, “Sectarianism and the Battle of Narr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yrian Uprising,” in Raymond Hinnebusch, Omar Imady (eds.), *The Syrian Uprising: Domestic Origins and Early Trajec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226–227.

⑥ Rustum Mahmoud, Stephan Rosiny, *Opposition Visions for Preserving Syria's Ethnic-Sectarian Mosaic*, 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 2015, p. 5.

⑦ B. Zeno, “The Making of Sects: Boundary Making and the Sectarianisation of the Syrian Uprising, 2011–201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8, no. 3, 2022, p. 1050.

随着冲突延长与暴力升级,逊尼派的宗派化言论与行为趋于极端化。例如,逊尼派教士阿德南·阿鲁尔(Adnan al-Aroor)公开威胁要对阿拉维派实施暴力,扬言“将其剁成肉泥”。2013 年,努斯拉阵线在阿德拉地区处决了 40 名基督徒、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人员。^① 战争导致流离失所与族群清洗事件频发,族群暴力言论不断蔓延。因此,阿拉维派主导的安全部队与亲政权民兵的镇压,与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宗派化叙事相互激化,最终使革命蜕变为逊尼派—阿拉维派内战。^②

3. 外部势力干预加剧了叙利亚族群宗派化冲突并延长了内战。外部干预是叙利亚内战演变为族群宗派化冲突的重要催化剂,也折射出中东地区逊尼派—什叶派对立的宗派地缘政治特征。一方面,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出于教派认同与地缘政治考量,支持叙利亚逊尼反对派。卡塔尔于 2011 年 11 月通过利比亚盟友向反对派提供武器与资金,沙特亦提供军事援助;另外,两国还推动国际社会支持逊尼反对派力量。土耳其则支持以“叙利亚国民军”为代表的北方反对派,同时也支持其他能够对巴沙尔政权构成威胁的反对派组织。2011 年 7 月,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自由军获准在土耳其设立基地。另一方面,伊朗出于什叶派教派认同及构建“抵抗轴心”的战略需求,坚定支持阿萨德政权。至 2013 年,伊朗在叙利亚部署了规模庞大的军事特遣队,包括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民兵,由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③ 在全球层面,美国与俄罗斯分别支持逊尼反对派与阿拉维派主导的阿萨德政权。各方势力沿族群界限介入,加剧了族群宗派化行为并令冲突更加暴力持久。

自 2015 年之后,在俄罗斯与伊朗的援助下,巴沙尔政权逐渐击败反对派与“伊斯兰国”,重控大部分领土,并成为伊朗构筑的“抵抗轴心”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伊朗试图在叙利亚推动人口强制迁徙计划,意图在大马士革至黎巴嫩之间建立什叶派聚居区,并将逊尼派北迁。该计划遭到逊尼派平民抵制,导致逊尼派与阿拉维派及其他什叶派族群的宗派化对立继续加深。^④

尽管逊尼反对派人数占优,但内部意识形态分歧与相互竞争削弱了其凝聚力,使其难以对抗组织严密且获俄伊支持的政府军。2017—2024 年间,巴沙尔政权暂时稳住局势,保持其作为叙利亚合法性政府的地位。然而,该政权合法性已大幅流失,后期主要依靠家族及阿拉维派主导的军事安全机构维系,在逊尼派及其他族群中支持者寥寥。与此同时,逊尼反对派仍然保留了有组织的对抗力量。尤其是努斯拉阵线,在朱拉尼领导下从“基地”组织脱离,演化为“沙姆解放组织”,长期盘踞在伊德利卜省并逐渐发展壮大。而其他主要族群,如库尔德人在罗贾瓦地区、德鲁兹人在苏瓦达地区形成自治格局。各族群在叙利亚事实无政府状态下进一步“领地化”,呈现出更强的排他性宗派化趋势。这一局面随着 2024 年底巴沙尔政权被推翻而被打破。

五、去宗派化—安全困境挑战与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前景

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并演变为主要由伊朗支持的“抵抗轴心”与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在反复较量中,伊朗阵营暴露出现在代军事技术、情报搜集能力等方面的致命短板,不仅未能帮助哈马斯赢得战场主动,反而自身力量不断被削弱,无暇顾及阿萨德政权,并将其暴露在逊尼

① Florence Gaub, “Syrian Separation: Why Division is Not the Answer,” *Federal Academy for Security Policy*, no. 17, 2016, p. 3.

② Rustum Mahmoud, Stephan Rosiny, *Opposition Visions for Preserving Syria's Ethnic-Sectarian Mosaic*, 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 2015, p. 9.

③ Christopher Phillips, “Structure, Agency and External Involvement in the Syria Conflict,”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https://pomeps.org/structure-agency-and-external-involvement-in-the-syria-conflict>, 访问时间:2025-8-10。

④ Martin Chulov, “Iran Repopulates Syria with Shia Muslims to Help Tighten Regime's Control,” 14 Januar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an/13/irans-syria-project-pushing-population-shifts-to-increase-influence>, 访问时间:2025-8-10。

反对派的攻势之下。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在短短12天时间内被“沙姆解放组织”推翻;2025年3月,主要由逊尼派阿拉伯人组成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成立。这不仅意味着执政54年的阿萨德政权政治命运的终结,从族群关系角度也意味着少数民族阿拉维派统治地位的终结,长期被边缘化的主体族群逊尼派阿拉伯人得以在未来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理论上,民族国家建构包含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层面。国家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外观建构;而民族建构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核建构,旨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共同体。^①对于叙利亚这类长期存在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的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主要通过包容性手段逐步消除族群间因不信任和恐惧而滋生的宗派化问题,从而终止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为构建国族认同扫清障碍。然而,主要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构成的叙利亚过渡政府本身带有天然的宗派烙印,这也使去宗派化和消除安全困境的任务变得极为艰难。

为了体现多元性与包容性,叙过渡政府任命了一位阿拉维派代表担任交通部部长,一位德鲁兹派代表担任农业部部长。然而,政府实权仍掌握在以沙拉(即朱拉尼)为首的领导人亲信圈层手中,引发外界对其包容性的质疑。^②过渡政府试图通过整编各派武装建立统一军队,但德鲁兹人、库尔德人及部分逊尼派民兵对此持不信任态度。阿拉维派前政府人员大多逃回拉塔基亚山区,拒绝被收编。^③

持续的族群仇杀加剧了少数民族的不安全感,推动其进一步强化自治以自保。自2024年12月以来,逊尼派军事人员对阿拉维派不断展开报复性屠杀,激化了两派矛盾。2025年3月,阿拉维派复兴党残余势力与过渡政府安全部队在拉塔基亚爆发激烈冲突。尽管大部分阿拉维派平民与前政府无关,过渡政府军仍然杀害了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④此举也引发了其他族群的强烈不满,德鲁兹派官员谴责过渡政府屠杀阿拉维派的行为,宣称将加强自身军事能力以自保。^⑤事实上,叙过渡政府与德鲁兹人矛盾也在不断激化。2025年7月,因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⑥发生冲突,过渡政府派安全部队赴苏瓦达地区维稳,遭到德鲁兹人抵抗,随后政府对德鲁兹平民实施屠杀,但此举引发了德鲁兹人与贝都因人之间更疯狂的仇杀。^⑦因德鲁兹人是生活在叙利亚、黎巴嫩及以色列等地的跨境族群,以色列遂以保护德鲁兹人为名对叙过渡政府展开袭击。^⑧以色列的真实目的是趁机占领叙南部戈兰高地,但这一行为加剧了叙德鲁兹人的宗派化倾向,时至今日他们仍与过渡政府保持对抗状态。

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同样体现在过渡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在阿萨德时期,库尔德人长期

① 于春洋、周佳薇:《现代民族国家前途的三大影响因素及其关系》,载《世界民族》,2024年第2期。

② “Syrian President al-Sharaa Unveils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30 March,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3/30/syrian-president-unveils-transitional-government>, 访问时间:2025-8-20。

③ Mohammed Hassan, “Building Syria’s New Army: Future Plans and the Challenges Ahead,” 12 June, 202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building-syrias-new-army-future-plans-and-challenges-ahead>, 访问时间:2025-8-20。

④ William Christou, “Syrian Security Forces Execute 125 Civilians in Battle against Assad Loyalists,” 7 March,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mar/07/death-toll-rises-syrian-security-forces-struggle-quell-assad-loyalist-attacks>, 访问时间:2026-3-25。

⑤ “Syria’s Druze Spiritual Leader Slams New Syrian Leadership as ‘Extremist’,” 14 March, 202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50314090605/https://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syria/130320256>, 访问时间:2025-8-25。

⑥ 贝都因人是散居在阿拉伯半岛、约旦、叙利亚等地的原始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兴起后基本皈依逊尼派,但部分贝都因人依然保留部落生活遗风,被叙利亚过渡政府视为同族群进行保护。

⑦ مجزرة اللبدو من ريف مجزرة ونزوح جماعي للبدو من ريف السويداء بعد انسحاب قوات الجيش, <https://www.ajnet.me/politics/2025/7/17/>, 访问时间:2026-3-26。

⑧ “Who are the Druze, and Why is Israel Defending Them in Syria?” 24 July, 2025, <https://www.ajc.org/news/who-are-the-druze-and-why-is-israel-defending-them-in-syria>, 访问时间:2026-3-20。

遭受压迫与歧视,族群身份不被承认,权益被忽视。内战期间,库尔德人加入反阿萨德政权的战斗,成立“人民保卫部队”(YPG)保护叙东北部库尔德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2014年之后,叙库尔德人获得美国支持,协助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其自治地位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得到强化。然而,自2025年以来,叙过渡政府试图将库尔德人纳入国家统一进程,拒绝了其自治要求,导致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叙库尔德人的外部环境也在恶化。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转而支持以沙拉为首的叙过渡政府,同时抛弃了曾经支持的库尔德人。^①而土耳其则因国内库尔德问题,坚决反对叙库尔德人自治。自2025年下半年起,叙过渡政府与库尔德人开始发生零星冲突;2026年1月,双方爆发激烈战斗后,库尔德人被击败。^②库尔德人被迫同意与叙利亚政府实现军事和行政整合。从叙利亚国家统一角度来看,库尔德人的妥协为解决叙东北部的分裂割据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叙过渡政府在承认库尔德人的语言、受教育权及身份方面做出了积极姿态。^③然而,由于长期宗派化形成的信任赤字,双方协议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观察。鉴于库尔德人长期遭受阿拉伯人系统性排斥与歧视的经历,其与叙过渡政府的安全困境在短期内仍难以完全消除。

综上所述,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推进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仍面临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的结构性挑战,外部势力的干预更使这一局面复杂化。这种状况迫使叙过渡政府更多地采取暴力手段以控制其他族群,也使其宗派化特征难以轻易消除。迄今为止,尽管叙过渡政府已与库尔德人达成和平协议并承诺共建国家,但双方真正的和解应在彻底摒弃宗派化之后才能实现;而重返叙西北山区的阿拉维派和东南部的德鲁兹人,也不会轻易放弃宗派化手段以达成与政府的和解。各族群难以在精神上真正认同叙利亚国家层面的民族共同体,意味着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缺乏真实的内核基础。

六、结 语

本文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因果机理:在无政府或弱政府状态下,族群为自保而出现强化自身认同与政治动员的宗派化趋势,会引发其他族群的恐惧与敌对,从而形成安全困境;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并持续累积,易升级为冲突乃至内战,进而导致民族国家的解构。族群宗派化与安全困境相互强化形成的敌意螺旋,虽然其根源可追溯至历史上的宗派分歧,但主要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它本质上体现了古老的族群身份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错位,因而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以叙利亚为案例,本文系统梳理了这一逻辑的演变过程。对叙利亚过渡政府而言,重构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族群宗派化引发的安全困境累积问题。暴力只会进一步加剧宗派化行为,包容性手段才是化解族群冲突的正确出路。然而,受制于其本身的宗派色彩及外部不同势力的干预,包容性政策的实施空间仍然有限。

本文构建的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框架也适用于黎巴嫩、伊拉克等与叙利亚具有相似背景的国家。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多元族群且长期共存,但与叙利亚由单一族群主导中央政权不同,黎巴嫩和伊拉克实行教派分权体制。表面上看,这一制度设计符合其多元社会结构,但实际上两国处于弱政府状态,未能真正实现族群和平,反而强化了宗派化行为。例如,1975—1991年黎巴嫩内战

^① Gregory Aftandilian, “The Shrinking Space for Kurdish Autonomy in Syria,” 26 February, 2026, <https://arabcenterdc.org/resource/the-shrinking-space-for-kurdish-autonomy-in-syria/>, 访问时间:2026-3-20。

^② Ghaith Alsayed, “Kurdish Fighters Evacuated from Aleppo after Days of Violent Clashes,” 11 January, 2026, <https://apnews.com/article/aleppo-syria-kurds-sdf-fighting-4cb2f16a58436205aea2cd8503a85296>, 访问时间:2026-3-26。

^③ Winthrop M. Rodgers, “Wha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yria Mean for the Kurds, Chatham House,” 10 February, 2026,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2/what-recent-developments-syria-mean-kurds>, 访问时间:2026-3-26。

是基督教与穆斯林两大族群围绕权力再分配引发的冲突,其根源正是两大族群宗派化所导致的安全困境不断累积的结果;而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一支长期独立存在的武装力量,也反映出什叶派族群为自保而走向宗派化的现实。同样,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形成了逊尼派、什叶派与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三大族群彼此戒备、竞逐权力与资源,使由族群宗派化引发的安全困境呈现出结构性特征。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的长期存在,对黎巴嫩和伊拉克建构统一民族国家的努力构成了强大制约,也为外部势力利用族群矛盾介入两国内部事务提供了机会,导致两国长期陷入中东地缘政治竞逐的泥潭而难以脱身。以上案例进一步印证了族群宗派化—安全困境理论的解释力,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重要方向。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thnic Sectarianization – Security Dilemma” theory as an integ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synthesizes existing theories on sectarianism and ethnic security dilemma. This theory posits that in multi-ethnic states, anarchy or weak government often plunges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to a pervasive sense of insecurity. In an effort to protect themselves, ethnic groups often tend to sectarianize. However, such behavior is easily regarded by opposing groups as malicious or offensive, thereby triggering a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them.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sectarianization form a vicious circle,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outbreak of conflicts. In Syria, the continuous spiral escalation of the ethnic sectarianization-security dilemma has been a key factor causing major setbacks in its nation-state building. The phenomenon of ethnic sectarianization in Syria began to emerge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nitially developed during the French Mandate, during which the ethnic security dilemma started to take shape. However, the ethnic sectarianization-security dilemma was truly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partisan political strife and the Assad regime after Syrian independence. The Syrian civil war that erupted in 2011 was precisely the result of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sectarianization policies by the Assad regime, which led to the continuous escalation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the Alawite and ethnic groups primarily composed of Sunni Arabs. By the end of 2024, although the Assad regime has been overthrown by Sunni opposition forces, the Sunni-led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still faces structural challenges where ethnic sectarianiz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reinforce each other. This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external forces to intervene, making the prospects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Syrian nation-state full of uncertainties.

Keywords Ethnic Sectarianization Security Dilemma Syria Conflict

(韩建伟,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200083)

[责任编辑:黄凌翹]